



新民时论

梦想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应然，从应然走向实然，需要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没有梦想，不会打拼，而是他们虽曾梦想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但除了老天爷、圣君、清官和使客，他们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近代以来曾经饱受屈辱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的核心就是强国。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如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几乎一致认为这

个“强国梦”绝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加重要的还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是真正的强国。但是究竟如何完成强国梦，想法就各个不同了。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无非是大同、小康和治世，寄托了理想，也表现了无奈。

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梦想就有了新的版本。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新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强国之梦离不开民本之心。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

的个人组成的。个人之梦一无羁绊，也不连续不累积不下集待续。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没有人民的福祉，大同之梦和强国之梦将全部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反面。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上的重大变化，就是个人的权利意识和自主选择意识显著增强。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业，所有人都可以炒老板鱿鱼。

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今天的我们，不仅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如自己的公司可以上市，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有冤屈也可以有多种渠道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可以各想各的。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是情理和时势的水到渠成。社会、国家和个人原

本就是三位一体。社会不稳定，个人就难发展，国家不强，个人就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努力，付出那么大代价，古代的大同之梦和近代的强国之梦都未能很好实现，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重要一环——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梦。

有人认为，只要国家富，社会进步了，人民自然

就幸福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把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日益意识到的简明朴实的道理。大同之梦、强国之梦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幸福之梦实现无缝对接了，中国梦才能从应然走向实然。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唯有神话才能挽救神话

朱绩崧



北窗絮语

从新东方到新梦想，影片《中国合伙人》在一个行将破灭的神话里，又创造出一个神话。

一个美国混不下去的邓超，一个体制内混不下去的黄晓明，一个除了混什么也不会的佟大为。这样三个人，从未名、昆明两湖畔的山楂树林里走出创业，浆糊桶，破厂房，两千多学生还带住宿，遇到官僚扯皮，警察刁难，只需塞钱了事，如此轻而易举。然后，我们就看到哥仁在CBD写字楼里谈笑风生，复勾心斗角也。

吃这点苦，就创业了，就建立起世界第一大教育集团的帝国了。换作我，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得上啊。有人要说了：光吃苦不行，创业得有核心竞争力，他们有，你还没有。

十年前，我为谋财，在厨师学校打过工，为期不太短，至今对其所谓核心竞争力总培养不出任何好感。当我看到成校长在外国大爷开的炸鸡店里把pregnant（怀孕的）解释成“扑来个男的”，就知道这十年来，核心竞争力停滞难涨。新梦想，新厨房，其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电影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颠覆以课本、教师为主体的旧制度，建立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制度。学生给老师打分，可以炒他们鱿鱼。算得上大革命了吧？

当然是大革命！金钱革了教育的大命。只要取悦学生，就是好老师。学生交笔钱，听老师说师母如何打越洋电话跟他分手，十分感动，备受激励，卡耐基附体。可说好的英语呢？英语就是“扑来三个男的”，口语拙劣，笔头功夫想来也够呛，但已忙不迭跑上神坛，精英着，教父着，俯视苍生嗤类起来。

电影里，新梦想的学生，尽是愚民，这并不违背现实。但把中国最好的“燕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徐达内



新“传”说

上回说到过刘志军，没过一两天，微博论坛上就有了“北京潜伏六千刘志军”的说法。

多家媒体纷纷引用经济观察报报道，称投资人查立宣布“北京至少有五六千个手里有300套房的房东”：“这在中国任何房地产市场调研报告中都找不到，当我们的创业者告诉我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都不相信”。

回头查找，第一个从一篇关于移动互联网投资的文章中发掘出可以与刘志军相关的所谓“亮点”的人，很可能来自和讯网。这家以财经报道为专业的网站，在13日下午慧眼独具，提炼出“知名VC爆料北京至少6000人手握300套房”的新闻点，其理财中心总监何庆宇更在转发推荐时自愿担当证人：“查总的数据我相信。北京至少6000人手握300套房，按每套房值300万计算，总值达5.4万亿，约合8793亿美元……去年某部级高官在一不公开场合也说过，北京人均77套房”。

和讯的何总监大概真知道点内情。但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些一见“亮点”便两眼发光、跟风转载的媒体编辑，绝大多数都没有真的点开所附链接——记录显示，这篇查立的发言是在20天前发表出来的。

其实，查立本人在13日子夜就已经通过微博“为防误读，特此解释”，强调那几千个手里有300间房的是“中介业主”，而且是“一套120平的公寓，按30平/间分割出租，就是4套房”。

只不过，查立的这个声明远不及爆料来得传播广泛。因为可以推算出“北京潜伏六千刘志军”，20天前的文章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在此后一两天的传播中，更由于香港南华早报的引用、环球时报的编译，而俨然成为有模有样的新闻。至于那些本就以贩卖愤怒来谋取名利的营销微博账号，更是一派义愤填膺模样。

人民日报看不下去。18日

专门发表《“北京6000房东每人300套房”系误读》的求证稿，由查立指责“这条网络谣言，完全扭曲了我的观点”，并且，在此后各色接力报道中，“没有一家媒体就此事采访过我”。文中，这位看上去变得气愤的投资人得以重申，“五六千人”不是指拥有房屋产权的房主数量，而是指拥有待租房源的房屋中介，并承认：“其中涉及房子的‘套’，实为口语说法。出于尊重记者并未提出审稿要求。如果把‘套’改成‘间’，‘房东’明确为‘中介’，也许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如果查立以及受访的经济观察报记者沈建缘所述为真，那么，这应该就是口述型采访的天然毛病，口语化的表达看上去生动活泼，甚至也节省媒体精力，但不加审核确认地刊出，却极容易埋下词不达意的隐患。

实际上，在“北京潜伏六千刘志军”出现之初，就有一些富有网络传闻辨别素养者表明过他们的不以为然，原因就是没有可供查证的数据支撑。只不过，对于房子和贪腐这样一对绝配来说，这点理性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被人民日报辟了一回谣后，@查立算是愿意自此承诺“无论原创或转发，确保内容真实无误”了：“当自己被卷入舆论漩涡，才会发现，随手转个假新闻，不是说句‘很遗憾’就能一笑置之的事”。

但也正像查立所说，从网络评论来看，很多人更希望这则“爆料”是真的，也有很多人相信实际情况也许更严重。最典型的代表仍是那位已被批为“断章取义”的和讯理财中心总监何庆宇：“人们其实更关心的是，这些手握几十上百套房产的人，有多少是房叔、房姐？有多少隐含的公职人员贪腐行为？正是人们对楼市豪客的直观感受、对房价的惶恐、对或多或少听闻过的官场小道消息的整合判断、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严重不满，才导致这条消息变得火爆”。

好了，又回到官员财产公开的老话题了。

高考沦陷，能否动一动‘顶戴’

李泓冰



余烬录

一生中，从耳边滑过的话无数，对我来说，有一句很平常的抱怨，却始终刻骨铭心，且每到高考季节就会在我的心中响如黄钟大吕。

若干年前，一位有点身份因此也颇有能量的朋友在谈及孩子高考后想“运动运动”时，愤愤然说：“没想到这高考还真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找了这么多人，都说最低分数线不到就毫无办法！”我很不厚道地暗自拍手称快：那些优秀的贫寒子弟，总算还有一条“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上升通道可走。

高考取士，几乎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最好最严密的制度了。它维系的，是中国基本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渐被固化的社会阶层中，它是年复一年不懈游走搅和的残存的“鲇鱼”。

然而，这回湖北高考强县钟祥考场发生的家长围殴监考老师事件的离奇逻辑，让人弹眼落睛，更有肺腑之痛。

家长义愤填膺的缘由是“不作弊，无公平”。听者匪夷所思，说者振振有词：你异地老师管住了一个考场，别的考场依然作弊成风，公平吗？过去高考舞弊泛滥也没人管，家长们今年大规模砸钱作弊，可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公平吗？

寒啊！

最寒的，不是钟祥高考舞弊的肆无忌惮，而是打砸家长捍卫作弊公平论时的“凛然正气”，是钟祥当地领导谈及此事时透着的充分体谅，“监考太严，少数考生没有考好，学生及家长发泄不满情绪”……

从已经浮出冰山的细节来看，有能力调动如此丰富的资源来做成全方位舞弊，非少数人所为，官、商、民集体勾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产业，一条上下串通

的利益链条，有的要政绩，有的要利益，有的要成绩，各色人等遂一拍即合，居然可以把本来只敢私下运作的高考舞弊，明目张胆地做出了美誉度，甚至做出了正义感。

多达“一两千”之众的家长，为了捍卫高考作弊，而试图国殴异地来的监考老师，这一幕，是国中最丑陋最臭不可闻的创新举动。它所昭示的，是一些地方基础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彻底崩塌。

对明目张胆的无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洪水已经在某个薄弱的堤坝冲决而入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捍卫高考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呢？

不好意思，又一次翻故纸堆了，咱能不能学先祖用重典？

翻翻清史稿，咸丰帝时代发生过著名的顺天乡试案，“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替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清史稿·文宗本纪》）。瞧瞧，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就因为家人调换“中卷批条”被活活处斩，而同科中因舞弊被斩者数人。

其实，这不是晚清的发明。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的和平年代，官员可能掉脑袋的，有两个触碰不得的“红线”，一是河工不力，因黄河泛滥激发民变可以直接勒住王朝的脖子，“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还有一个，就是科场舞弊，这将阻塞社会阶层有序流动、“天子门生”有变成废物草包的危险，让王朝有陷入慢性自杀的。所以，严刑峻法应对科举舞弊，是封建王朝力图自保的制度惯性。

敢挑战高考舞弊底线的人有恃无恐，前赴后继，盖因舞弊成本太过低廉。

那，为了国本稳固，就算不能人头落地，至少摘去顶戴，可乎？